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邓广铭赠书述略

□饶益波*

摘要 北京大学图书馆新入藏邓广铭专藏古籍六千四百余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赠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邓广铭赠书保存完好,版本类别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赠书在内容上集中于宋辽金元史,尤其在宋人文集和宋代史籍方面搜罗齐备,颇能反映邓广铭的治学旨趣。其中包含大量邓广铭学术研究中的工作记录,是研究邓广铭的一手史料,在促进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方面也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邓广铭 古籍 赠书 治学风格

分类号 G253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3.02.012

1 引言

2021年7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接受了邓可蕴女士和邓小南教授捐赠的其父邓广铭先生(为行文方便,以下皆省去“先生”二字)的藏书,包括线装古籍37箱,共计6458册。2022年3月,北大图书馆完成了这批赠书的编目整理工作。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著述宏富,主要研究方向为宋辽金史,尤其在宋史领域建树颇多,被誉为“宋史泰斗”。1956年,邓广铭在北京大学课堂上提出将目录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视作治史的“四把钥匙”的观点,对于促进目录学、文献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以往对邓广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学术观点的阐发和弘扬,而针对其藏书的研究则一直是个空白。在邓广铭逝世24年后,邓可蕴女士和邓小南教授化私藏为公用,慷慨将邓广铭这批藏书捐赠给北大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北大图书馆的古籍特藏,同时也为学术界对邓广铭的藏书、治学、学行等方面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一手资料。

2 邓广铭赠书的来源

作为一位纯粹的历史学者,邓广铭藏书主要服

务于其学术研究,不以广购善本秘籍以自矜。从这批赠书来看,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2.1 购置图书

邓广铭自小接触传统学问,旧学根底深厚,1932年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1936年留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任教于大后方,由于缺乏史料,这段时间的书籍购置情况不易考察清楚。但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邓广铭这段时间充分利用北平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的藏书来看^[1],邓广铭在这期间的图书购置显然不会太多。其大规模地购置古籍应该是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之后,他在《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一文中提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于1946年初夏飞回北平,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那时候古旧书业极不景气,古旧书价贬值,我便乘机围绕我的专业,尽量购置一些图书,建立我自己的小书库^[1]。”1958年,邓广铭在“双反运动”中遭到批判,此后学术研究一度停滞,但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他的文献收藏工作仍然没有完全陷入停顿。

在邓广铭赠书中,我们发现了极少量的购书发票,是考察其古籍购置历程的绝佳史料。其大体情况如表1所示。

* 饶益波,邮箱:raoyb@lib.pku.edu.cn。



表1 邓广铭购书发票统计表

书名	版本及册数	购置时间	购置地点	价格(元)
四明文献集	民国五年[1916]铅印本;4册			3.00
考古质疑	清同治七年[1868]福建刻本;2册			1.00
稼轩词疏证	版本不详;3册			6.50
晁具茨集	清知不足斋刻本;2册			3.00
七修类稿	版本不详;16册	1958年8月14日	琉璃厂古书店	8.00
程氏人物志	民国三十六年[1947]石印本;4册			2.50
金元戏曲方言考	版本不详;1册			0.41
文澄公集	版本不详;4册			2.50
蔡忠惠集	清雍正十二年[1734]温陵蔡氏逊敏斋刻本;10册			8.00
眉山诗案广证	清光绪十年[1884]江苏书局刻本;2册	1958年8月15日	琉璃厂古书店	2.50
南阳集	清抄本;6册	1958年9月3日	来熏阁书店	12.00

发票中列出了书名、册数、金额以及书店名称,但并未列出版本。表中的版本项是我们根据发票中开列的书名,结合此次编目数据判断出来的,版本不详者则未在此次赠书中。从发票中的购书金额来看,的确符合邓广铭文中“古旧书价贬值”的描述。此外,在赠书中发现的发票,时间都在1958年8月之后,推测是“双反运动”之后,这些书来不及及翻阅使用,所以发票一直保存在书中。

2.2 学术往来所得文献

作为史学界成名较早的学术大家,在邓广铭的学术生涯中,既受到了不少前辈学者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宋辽金史等学术领域的几代学人。从这批赠书中,颇可可见其学术交流活动 and 学术经历。

在邓广铭赠书中,我们发现了他在学术往来中获得的一些著作,如陈寅恪所赠的《元白诗笺证稿》,内有陈寅恪墨题“恭三兄 教正/寅恪”,是记录陈、邓两位先生学术交流的珍贵实物。早在1937年,邓广铭于《国闻周报》发表《〈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证》之时,就受到陈寅恪的关注。1939年秋至1940年夏,邓广铭在昆明与陈寅恪相处甚欢,“与陈先生同桌共餐,朝夕得以聆听他的教言”^[2],“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3],因而邓广铭晚年回忆自己的学术师承时说过,“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4]。

赠书中还有王重民签赠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书衣墨题“恭三先生教正/重民敬赠/卅七.四.廿一”。1934年,王重民以交换馆员身份前往巴黎整

理被伯希和劫夺的敦煌文献,并逐一进行考订,相关成果发表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以及《图书季刊》上,1936年结集为《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一辑,1941年又出版第二辑。1947年回国后,王重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并着手创建图书馆专修科(至1951年改为图书馆学系,开始招收本科生)。1952年院系调整后,王重民专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直至1975年离世。邓、王两位先生同时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都长期居住在朗润园,往来非常密切,这册《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的签赠发生在1948年4月21日,即王重民回国后不久,是见证邓广铭和王重民学术交往的罕见文献。

此外,在邓广铭赠书中还有齐白石自写影印本《借山吟馆诗草》,书衣上有齐白石墨题“适之道兄先生一笑论证/弟齐璜敬呈”,并钤“白石相赠”白文朱印。书中夹有胡适先生手稿两纸,纸高28cm、宽21cm,呈竖排格状,竖排20行,横排10行,手稿的内容是胡适对《齐白石年谱》成书过程的记录。胡适、黎锦熙、邓广铭三人曾合作撰写过《齐白石年谱》,邓广铭对此事有过记录^[5-6],三人合作的始末以及各自的贡献已有学者进行过详细的研究^[7-8],兹不赘述。《齐白石年谱》的稿本今藏北京画院,稿纸的形态与此次发现者全同,从内容上看,此次发现的胡适手稿应属于胡适所撰《齐白石年谱序》的未定残稿。

2.3 自抄文献

在邓广铭赠书中,由其亲自抄录的文献仅有《建隆编》一部,该书无边框界栏,半叶六行,行十八字,小



字双行同,书末署“民国廿四年七月十日钞讫于北平报子胡同寓庐/恭三”。考民国廿四年(1935)邓广铭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上大学三年级,此时他对未来的学术研究还没有明确的方向,而《建隆编》一书久已失传,在学术史上一向没有受到重视,他何以会如此突兀地抄录此书?这显然与当时北京大学史学系任课老师以及相关课程有很大的关系。从邓广铭的“一九三六年毕业成绩审查表”中可以考见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的课程情况,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邓广铭选修了蒙文通的宋史课程,并且在课程中得了很好的成绩^[9]。

蒙文通(1894—1968),原名尔达,以字行,四川盐亭人,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即在成都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任教,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佛学家、经学家。1934至1935年,时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的蒙文通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宋史课程,当时的课程大纲仍有留存,部分内容如下:

注重探讨有宋一代政治之升降、学术之转变、制度之沿革、民族之盛衰,以吕东莱、陈君举、叶水心之说为本,取材于《东都事略》《南宋书》《宋朝事实》《太平治迹》,以济元修《宋史》之阙。更从《文献通考》辑出《建隆编》佚文,以为《宋会要》之纲。^[10]

从这份课程大纲中可以看出,蒙文通在其宋史课程的安排方面构思已经非常成熟,课程设置非常详实且具体,其中提到的“从《文献通考》辑出《建隆编》佚文,以为《宋会要》之纲”,更是可以看做这一课程在文献整理方面的一次实践。

邓广铭所藏《建隆编》抄本,各条前均冠有“止斋陈氏曰”字样,通过文字核对,其文献来源确系《文献通考》无疑。从书末所署“民国廿四年七月十日钞讫”的文字来看,该抄本的形成和蒙文通及其所讲授的课程有着直接关系。书中夹有长纸条一张,末书“建隆编(抄本)——陈傅良著”,纸条末端露出书外,是邓广铭为方便取书所做的标记。从以上这些信息可以推测,蒙文通在北京大学教授宋史课程的过程中,曾着手辑录过《建隆编》一书,邓广铭所藏的抄本,应该是他根据蒙文通的辑录本过录而来。蒙文通的辑本现不知存于何处,其存佚情况亦未可知,邓广铭藏本或为蒙氏辑本的唯一传抄本,学术价值极大。

关于蒙文通对邓广铭的学术影响,邓广铭本人鲜有提及,刘浦江教授曾指出“大学时代,邓广铭也上过两门属于这个领域的专业课,一门是蒙文通讲授的宋史,另一门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史。但这两位先生都没有给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什么重要影响,他对这两位学者的评价也比较低调”^[11]。聂文华在其《邓广铭宋史研究学术渊源考——以蒙文通宋史课程的讲授为中心》一文中虽然有所论证,但文中多为猜想和旁证,始终缺乏实证^[12]。从邓广铭在这堂课中所取得的成绩(92.5分)来看,蒙文通对邓广铭是比较认可的,故而聂文华所说的“或许可以说他(笔者案:指邓广铭)后来对宋史的兴趣即发端于蒙文通宋史课程的激励”^[12]这一推断有一定的道理,而这部《建隆编》抄本则可以作为蒙文通对邓广铭学术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文献史料。

邓广铭于1946年由重庆复旦大学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50年晋升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54年至1966年间一直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是邓广铭学术创造力极为旺盛的一个阶段”^[11]。其中,1953年出版《王安石》,1955年出版《岳飞传》,1956年出版《辛弃疾传》《稼轩诗文钞存》,1957年出版《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1958年,邓广铭在“双反运动”中受到批判,此后,其学术研究工作一度停滞长达数十年。从邓广铭的这段经历,以及上述邓广铭大量购藏图书的时间来看,其藏书丰富的时期正是其学术研究最为旺盛的时期。

3 邓广铭赠书的特点

如上文所述,邓广铭这批赠书的收藏时间主要集中在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邓广铭在《我和图书馆》一文中也一再提到:“自从抗日战争胜利,我由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回到北京大学以来,便已开始逐步地在家中建立起一个小小书库(主要是围绕自己的专业)。从1946年直到50年代之初,古旧书籍因很少人问津,价格极为便宜,这使我得以大量购买。到五十年代后期,我已经拥有了一个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的小图书室^[13]。”由此可知,邓广铭的文献收藏是围绕自身专业来开展的;同时,邓广铭购置图书的一个较大动机就是书价便宜。这两点都可以与邓广铭赠书相印证,在此基础上,我们对邓广铭赠书的特征进行了如下总结。

首先,邓广铭赠书保存完好,数量众多,在北大



图书馆接受赠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版刻时间来看,邓广铭赠书中包含少量明初、明中期刻本,明后期刻本则主要分布在明万历、崇祯两朝;清代刻本除顺治朝外,康雍乾三朝直到清末基本都有涵盖;民国刻本达50余种之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赠书中有几部特殊的文献,如明嘉靖刻清递修本《宋丞相崔清献公言行录》,明末刻民国八年递修本《赵清猷公集》,版刻时间和印刷时间相差较大,且都有不同程度的修版补版,这对于研究明清两代的版刻特征乃至出版史等都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从版本类别来看,邓广铭赠书涵盖了刻本、抄本、活字本、铅印本、影印本等多种形式,在古籍鉴赏以及古籍版本学的研究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其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不容忽视。

其次,邓广铭赠书中丛书占比较大。对于单行本的典籍来说,学者购藏某一类书籍费时费力,往往难以齐备,在搜集文献上极为不便。更有甚者,由于种种原因,古书单行成本要远大于汇刻本,这就导致很多有价值的小部头典籍往往只能汇入丛书本发行,或者以传抄的方式进行流传,这无论是对古书的传承还是学术的发展来说都是很不利。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曾言“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钜。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14]。古代学者推崇丛书,主要是由于丛书“汇聚众书”的功能和“易于购置”的特点。邓广铭赠书中,丛书及丛书零种共计167种之多,占比极高。其中时代较早的有明会稽商氏半菴堂刻《稗海》零种,最晚的则包含了建国后出版的著作,时间跨度较大。在一众丛书之中,篇幅最大的当属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此书为《四库全书》首次影印(选印)出版,共刷印1500部,得此一书,基本上能满足邓广铭对四部要籍的需求。

再次,邓广铭藏书的购置主要围绕其学术研究方向。邓广铭聚书“主要是围绕自己的专业”,其目的非常明确,这一点从其购书过程中的文献偏重也可以得到佐证。如邓广铭赠书中,有六部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典籍,分别是宋人李攸的《宋朝事实》、王质的《雪山集》、毕仲游的《西台集》、赵升的《朝野类要》、陆佃的《陶山集》和刘攽的《彭城集》,无一例外都是宋代文献,其中宋代史籍两种、宋人文集四种。同样,邓广铭购置的《知不足斋丛书》四个零种也无

一例外都是宋人著作。邓广铭藏书主要以宋辽金元史籍文献为主,包含了宋辽金人所著史籍、文集以及后人研究宋辽金元史的相关著作,尤其在宋代史籍和宋人文集方面搜罗最为齐备,可以视为一个宋代文献专题资料库,这是其藏书的最大特色。基于这一因素,邓广铭藏书最适合整体专藏,这样既能够保证其所藏文献的整体性,展现邓广铭藏书、治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也能够发挥这批专藏的学术作用,对宋辽金元史学者的学术研究也是深有益处的。

最后,尽管邓广铭在文献搜集中不追求秘籍善本,但从此次整理编目情况来看,赠书中善本古籍也不在少数。其中明刻本15种、清康熙刻本9种,清雍正刻本1种、清乾隆刻本17种;另外还有一些民国铅印本、影印本,由于含有大量名家批校题跋等,可归为善本。尤其难能更可贵的是,其中不少文献如清抄本《新安志补》、民国抄本《建隆编》等流传极稀,对北大图书馆的馆藏是重要的补充。

4 从邓广铭赠书看其治学风格

邓广铭在《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中引用过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的一句话:“由汉代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15]。”刘浦江教授据此总结出邓广铭的治学风格为“独断之学,考索之功”。邓广铭的“独断之学”,前贤已有多角度的论述;“考索之功”方面,学界大多瞩目于邓广铭的文献考据功夫。考据学功底必定是根植于学者对基础史料深度掌握的基础之上,邓广铭治学最重视史料搜集、整理、解析等基础性工作,这与他求学期间深受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观点的影响有较大关系。他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中有如下表述:

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才不致被庞杂混乱的记载迷惑了视觉和认知能力而陷身于误区,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相。^[16]

要考察邓广铭在史料运用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他的藏书是绕不开的绝佳史料,前贤由于未能深度整理先生的藏书,故所论多宏通之言,未能窥见精微之



处^[11,17]。泛览先生赠书,浮签满纸,朱墨灿然,其所作的基础性史料工作留下的痕迹触目皆是,不胜枚举。

4.1 重视文献辑补

在史料搜集方面,邓广铭从不拘泥于所藏之书的现有文本面貌,往往在原书基础上进行大量的史料增补工作。如《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中有宋人吕颐浩的《忠穆集》,吕氏文集在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中有著录,但原本久佚,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文章 137 篇、诗词 58 首,有所遗漏是必然的。邓广铭在《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忠穆集》中夹有数页文稿,都是四库本《忠穆集》失收的内容,分别为《论航海事》《论察言》《乞巡幸浙西及措置溃兵》《论车驾乘马事状贴黄》及宋人赵粹中的《吕忠穆公文集序》等五篇文字,另外还誊录有嘉靖庚子(嘉靖十九年,1540)吕栻识语一则,由此可推知,邓广铭的这些文字是从嘉靖十九年吕栻刻《吕忠穆公奏议》中誊录而来。

4.2 “穷尽史料”的治学观念

邓广铭基础性的史料工作还表现在其“穷尽史料”的治学理念上。上文所述邓广铭的史料增补工作固然可算作是“穷尽史料”的一种表现,但从其赠书整体来看,这种史料增补工作多是随手为之,不成体系。真正能够充分表现邓广铭“穷尽史料”治学理念的是他在校勘工作中对引文的校勘。

在邓广铭赠书中,有一部清光绪七年(1881)浙江书局刻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书中有大量圈点批校痕迹,记录了邓广铭校勘此书的经历。1949年2月,邓广铭以自己所藏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续资治通鉴长编》抄本,并且与傅增湘所藏抄本以及金毓黻所藏抄本进行详细的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书篇幅达 520 卷之多,分装为 12 函 120 册,面对如此煌然巨著,还需要对校三个不同版本,其中的艰苦可想而知。邓广铭在繁重细碎的校勘工作中,对《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征引的其他文献也务求穷尽史料,广罗众本,进行详细的文字校勘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邓广铭发现《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了不少司马光《涑水记闻》的文字,又取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进行对比,意外地发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引文大多比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更完备,“这引起了我的极大注意,也等于为我们校勘《涑水记闻》打开了一个缺口”^[18]。此后,邓广铭在商务印书馆铅印本的基础上,将《续资治通鉴长编》所引的条目逐一进行比对,并与《学海类编》本以及夏敬观

引用过的清钞两卷本进行了比勘。在校勘的同时,邓广铭针对《涑水记闻》中的条目,广泛地搜罗其他引文以资校勘,所用到的文献有《皇朝类苑》《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说郛》《旧闻证误补遗》《宋史·吕端传》《归田录》《河南文集》《范文正集》《范文正公年谱》等等。由《续资治通鉴长编》到《涑水记闻》,再到与《涑水记闻》相关的众多文献,邓广铭剥茧抽丝,在“穷尽史料”方面可谓做到了极致。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后来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被迫中断,所幸这一朱墨灿然的校订本并未受损,随着这批赠书一起入藏北大图书馆。这部《涑水记闻》为民国九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钤“恭三”朱文印,从版本价值上看似乎并不稀奇,其真正的价值是书中有邓广铭大量的圈点批校痕迹。上世纪 80 年代,邓广铭和张希清合作整理了《涑水记闻》,并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个版本是学界目前利用率最高的版本,其校勘整理的基础就是这一批校本。遗憾的是整理本出于体例统一的需要,又删去了批校本中邓广铭的不少批语,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批校本仍然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4.3 深厚的校勘学功底

邓广铭的基础性的史料工作还表现在其深厚的校勘学功底。通过考察邓广铭对《续资治通鉴长编》及《涑水记闻》二书的校勘发现,邓广铭在校勘方法上最注重运用对校法和他校法。对校法是运用同书的不同版本进行比对,择定底本,校订异文的常用方法,因此对校法的运用往往需要先对一书的版本进行详尽的考察,对校勘前期的准备工作要求极高。邓广铭在校勘一书的前期准备工作中,会花费大量精力对该书的版本进行详尽考察,不仅考证各版本之源流,对于各本之优劣异同也时有独到的见解。在调查版本的基础上,尽量搜罗异本以资校勘。如在校勘《涑水记闻》一书的过程中,邓广铭和张希清“首先把《记闻》的各种钞本和刻本都进行了一番对比,所得的结论是,确实以两卷本的条目编次为最好,其中字句的脱漏和错讹也最少。遂决定用明钞两卷本和清钞两卷本作为底本,先与小山堂钞本残卷、学海类编本、聚珍版丛书本逐一进行了对校”^[18]。

由上述邓广铭“穷尽史料”的治学风格也可以看见,邓广铭在校勘过程中对他校法的运用最为精妙,往往能在校勘一书的过程中不断衍生出新的学术增长点。如上述邓广铭在校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



时,运用他校法校勘出《涑水记闻》的种种问题,在校勘《涑水记闻》之时,又“与续通鉴长编、《宋朝事实类苑》《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宋史》《永乐大典》等书进行了他校,对于底本的订正和补充,为数也颇为不少”^[18]。邓广铭通过对校法廓清版本问题,确定校勘底本,初步校出异文,又通过他校法对文本进行更深层次的订补,两种方法互相配合补充,这是其校勘工作的最大特色。邓广铭在《涑水记闻》的点校说明中也明确地表达过“在进行对校和他校的过程中,从二者所获补益是大致相同的”^[18]。

从邓广铭赠书中,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其“独断之学”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虽为独断之学,但无一字无来处,其论点皆有扎实的文献基础作为支撑。我们在探讨邓广铭高瞻远瞩的史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的同时,更应该从先生的藏书中去挖掘其读书治学的门径。可以说,邓广铭的学术成就是建立在其对史料孜孜不倦的搜集、逐字逐句校勘研读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文献上的“笨功夫”是邓广铭成长为一代史学大师的不二法门,也应该为从事传统学术研究者所借鉴。

5 结语

综上所述,邓广铭赠书数量庞大,保存完好,时代跨越明、清至民国,从版本类别来看,涵盖了刻本、抄本、活字本、影印本等多种形式,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从内容方面看,宋代史籍和宋人文集搜罗齐备,颇能反映邓广铭读书治学的兴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中不少文献属于新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北大图书馆的馆藏。赠书包含了邓广铭学术研究中大量的点滴记录,是我们研究邓广铭、研究近现代史学史的一手史料,对于未来拓展“邓广铭研究”“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路径、补充完善《邓广铭先生学术年表》等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基于上述原因,北大图书馆为这批赠书建立了整体专藏,以便于促进宋辽金元史以及近现代史学史等学科领域的研究。

聚书诚不易,邓广铭的图书收藏最能反映先生对学问的执着追求,邓小南教授在邓广铭藏书捐赠仪式上回忆道:“抗战胜利后,他应傅斯年先生要求回到北大,他和我母亲再三斟酌后,放弃了买房安家的打算,全部积蓄除基本生活外,都用来购置图书^[19]。”作为我国宋史研究的泰斗,邓广铭无论是独

断精深的学问,还是求真求实的品格,都对北京大学、对学术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邓广铭赠书中,我们能够最为直接地感受到一代学人在文献搜集方面的孜孜不倦,在史料整理和校勘方面的艰苦朴拙。这批珍贵藏书既是北大精神的历史定格,同时也必将彪炳史册,铸就北大精神的学术丰碑。

参考文献

- 1 邓广铭.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M]//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445.
- 2 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M]//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330.
- 3 邓广铭.自传[M]//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415.
- 4 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M]//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308.
- 5 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M]//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283-284.
- 6 邓广铭.我与胡适[M]//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297-298.
- 7 吕晓.胡适、黎锦熙、邓广铭合编《齐白石年谱》研究[C]//齐白石研究(第五辑).2017:84-101.
- 8 罗家宽,孙亚军.胡适版《齐白石年谱》管窥[J].中国书画,2020(6):122-124.
- 9 邓广铭.一九三六年毕业成绩审查表[M]//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图版.
- 10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史学系课程一览[M].北京: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1934:111.
- 11 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J].历史研究,1999(5):114-129.
- 12 聂文华.邓广铭宋史研究学术渊源考——以蒙文通宋史课程的讲授为中心[J].史学月刊,2015(3):17-23.
- 13 邓广铭.我和图书馆[M]//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436.
- 14 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M].范希曾,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25.
- 15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477.
- 16 邓广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8.
- 17 包伟民.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格[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52-58.
- 18 司马光.涑水记闻[M].邓广铭,张希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21.
- 19 邓小南.我与父亲之间的精神纽带——在邓广铭藏书捐赠仪式上的讲话[EB/OL].[2022-03-16].https://mp.weixin.qq.com/s/P111XV_Vm9smNhlU6XhGjg.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22年3月30日

修回日期:2022年9月20日

(责任编辑:李晓东)

(转第114页)